

关于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新天 吴春明

【摘要】台湾原住民研究肇始于清代理番时期的采风民族志，日据时期开启了近代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阶段，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的原住民研究，在民族志调查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近年来，台湾学者原住民研究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台湾；原住民研究；南岛语族

【作者】王新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 2004 级博士研究生；吴春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 (2007) 01-0030-008

Several Issues on the Study of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Wang Xintian, Wu Chumi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began from Qi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to the phase of indagation during the time that Taiwan was occupied by Japan. Then the study of the aborigines led by scholars in Taiwan got great development on the indagation of ethnography and the research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kind of inaccurate tendency that several scholars unilaterally emphasi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and Austronesian family has been appearing in recent years. Basing on the new research of ethnography indagation and by integrated multi-subject research, rebuilding the important item such as the origin, the history,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identifying of the nation on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is the unshirkable responsibility to the continent scholars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Taiwan; the Study of Aborigines; Austronesian family

台湾的原住民是指大陆汉民在明清时期大规模渡海来台之前居住于台湾地区的土著民族，包括现今台湾地区的山地高山族（狭义的高山族，以下简称“高山族”）和主要分布在西部平原高度汉化的平埔族人。山地高山族是指包括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曹族、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九族，以及近年台湾当局确认的日月潭邵族。平埔族虽高度汉化，其分类也众说纷纭，一般来说包括了西拉雅、洪雅、巴布萨、巴则海、拍瀑拉、道卡则、凯达格兰、噶玛兰等八族。台湾原住民最新的人口统计约 41 万，占岛屿人口的 1.8%，分布于台湾中、东部的一万六千平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研究”成果。

方公里、占 4.5%的土地上, 凸显少数民族的特征。¹

台湾原住民问题是台湾研究、民族研究的基础课题,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 “台独论”者大肆捏造原住民“南来论”、渲染“民族台独”,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因此开展台湾原住民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研究, 重建台湾原住民历史与文化的真实面貌, 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研究述评

不论是政治统治还是文化研究的目的, 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与研究主要应该包括了三个阶段, 即清代理番时期记述、日据时代的日本人的调查、光复以来台湾学者的调查研究, 这三个阶段恰好伴随着近古以来原住民社会文化变迁的三个重要时期。

1. 清代理番时期的采风民族志

清代理番时期对于台湾原住民社会文化的一系列采风记录与描述, 一般都被排除在学术史的总结之外, 因为它不属于教条的“近代学术史”的范畴。但是, 这一时期留下的有关原住民的一系列专题文献, 体现了汉人立场的台湾原住民最初的“民族志”。^④这些专题文本中, 不仅有治台官员主持编修的历朝《台湾府志》县、厅志中也有不同比例的“番社”、“番俗”、“番族”篇幅, 赴台官员、文人的笔记资料中还隐含着大量番族专题资料, 如黄叔瓚《台海使槎录》温吉《台湾番政志》蓝鼎元《鹿洲集》等。清代原住民文化实录中, 最值得重视的是许多直接描绘番族社会文化的图画资料, 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使署闲情》金廷标《职责图》佚名《台湾风俗图》《东宁陈氏番俗图》《台番图说》、《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等, 先于日据以来的近代民族志, 原汁原味, 弥足珍贵。可以说, 清代理番时期留下的关于原住民的一系列采风文献, 实际上是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的肇始, 是近代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台湾番族调查研究的直接前身。

2. 日据时期的调查

1895年, 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这也是近代西方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分类科学开始传入我国和东亚各国的时期, 正因此日据时期开启了近代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阶段。^⑤按照调查研究的主导机构的不同, 可以将日据时期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即东京人类学会时期、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台北帝大前期、台北帝大后期。

第一, 东京人类学会时期。东京人类学会就是近代西方人类学“西学东渐”背景下于 1884 年成立的, 以东京大学的人类学者为核心, 开展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著述出版。随着台湾割让于日本, 台湾原住民自然成为该学会主要的调查研究对象, 鸟居龙藏、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等是东京人类学会时期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的代表。鸟居龙藏是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的奠基者, 1896- 1900年间四次来台探险, 撰写红头屿、排湾、鲁凯、毕南、阿眉、阿里山、布农、鲸面、埔里社、平埔等九部民族志报告, 每部都有总说、地理、体质、语言、杂事等广义的人类学内容, 正式出版的只有 1902年的《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书》, 这也是原住民的第一本民族志。类似的工作还有伊能嘉矩和栗野传之合著的《台湾番人事情》(1900), 依据语言、风俗习惯等, 将台湾山地原住民分成 A taiyal Vonoum, Tsuou, Supayowan, Tsarisen, Piyuma, Amis, Peipo 八族, 又把平埔分成十小群, 与鸟居的分类共同奠定了台湾原住民分类、识别的基础。此外, 伊能嘉矩的《台湾番政志》(1904)、《台湾文化志》(1928) 和森丑之助《台湾番族志》(1917) 等, 也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 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1901年成立的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开启了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官方调查研究阶段, 该会于 1919年解体后以“番族调查会”的名义继续工作。两会出版了多种原住民的调查研究巨著, 如佐山融吉的《番族调查报告书》八册(1913- 1921年)、小岛由道等的《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八册(1915- 1920年)、岗松参太郎的《台湾番族惯习研究》八册(1918- 1921)、森丙牛《台湾番族志》(1917) 和《台湾番族图谱》二册(1918)、小泉铁的《番乡风物记》(1932)、《台湾土俗志》(1933) 等。此外, 由台湾

总督府直接组织调查出版的重要基础资料还有《番社户口》(1913-1943)、《高砂族调查书》六册(1936-1939)等。

第三,台北帝大前期。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据时代台湾设立的最重要的高校,即今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大“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和“语言学研究室”迅速成为新阶段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新中心。帝大时期的代表作是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马渊东一合作的《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的研究》(1935)、语言学研究室的小川尚义和浅井惠伦合著《原语高砂族传说集》(1935)、小川尚义的原住民语言研究《排湾语集》(1930)、《泰雅语集》(1931)、《阿美语集》(1933)等。

第四,台北帝大后期。日据时期的台湾原住民调查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以广义人类学(含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方法调查原住民社会文化,对原住民族群进行基础的分类识别,积累大量民族志资料,到了帝大后期有关原住民社会文化的理论研究开始增长,这应该是也得益于同一时期国际人类学界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倾向的出现。比如,帝大的马渊东一开始深入研究原住民的社会组织和亲属关系,先后发表《布农、邹两族的氏族组织及婚姻规定》(1934)、《布农、邹两族的亲族名称》(1934)、《布农族的祭典历》(1936)、《中部高砂族的祭团》(1937)、《中部高砂族父系中的母系地位》(1938)、《布农族的兽类分配与赠与》(1940)等,帝大社会学研究室冈田谦的《未开社会的家族》(1942)、产业经济研究室增田福太郎的《南方民族的婚姻——高砂族的婚姻研究》(1942)、奥田彗的《台湾番人的烧田学业》(1933)、《红头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1939)、《红头屿雅美族的产业》(1941)、国芬直一的《祭壶之村》(1944),以及战后出版的《台湾高砂族的住家》(1960)等。因此,不能一概否认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理论研究的成就。

3. 光复以来台湾学者的研究

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之后,我国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民族志调查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⁴在民族志调查上,1949年,迁台的中研院史语所、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在台北帝大土俗人种学教研室基础上成立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功组织了第一次本土学者的原住民族志调查,即“瑞岩民族学调查”,刚从大陆迁台的前中研院史语所、民族所的著名学者李济、石璋如、董作宾、芮逸夫等都参加了这项调查。⁵整个50-60年代,出版的民族志报告有十多种,主要有卫惠林、何联奎《台湾风土志》(1956)、《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1958)、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稿》(原住民各族篇)(1965)、李亦园、徐人仁、宋龙生、吴燕和《南澳的泰雅人》(1963)、阮昌锐《大港口阿美族》(1969)、石磊《筏湾,一个排湾族部落的民族田野调查报告》(1971)、台湾省民政厅《61年台湾省山地山胞经济调查报告》(1973)、《埔里巴宰七社志》(1981)、《阿里山邹族的历史与政治》(1990)等,这些报告大部分是以中研院民族所专刊的形式出版,部分发表于集刊。⁶

台湾学者在原住民问题上的主要建树应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层面的建构,涉及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制度、人口变迁、经济生活、语言分类等课题,而且这些理论研究凸显人类学参与观察研究的方法,几乎都将理论建构建立在个案社区文化的调研基础上。这方面出版的重要专刊就有,卫惠林、刘斌雄《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1962)、李亦园《阿美族的物质文化》(1962)、刘斌雄、丘其谦、石磊、陈清清《秀姑峦阿美族的社会组织》(1965)、丘其谦《布农族卡社群的社会组织》(1966)、费罗礼《台湾土著族的文化、语言分类探究》(1969)、何廷瑞《台湾高山族的传说与神话》(1970)、石磊《台湾土著血族型亲属制度:鲁凯、排湾、卑南三族群的比较研究》(1976)、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1982)、黄应贵《东埔:一个台湾中部布农族聚落的社会组织及其现代适应》(1983)。⁷除了这些专著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中国民族学报》《台湾文献》《台湾文化》《台湾风物》等刊物还发表一系列重要的调查研究专文。

最近二十多年来,台湾地区还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关原住民的综合性论述和论文集,其中相当部

分是长期从事原住民研究的民族学者的论文结集。凌纯声先生的代表作《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虽不是原住民专题的研究,但站在“中国一边疆”民族关系的格局看待台湾土著文化,代表了迁台的前中研院老一辈学者的一般学术视野。^⑭李壬癸的《台湾原住民的族群与迁徙》(1997),从语言学的立场,结合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站在宏观视野上,对台湾原住民的构成、来源迁徙、大陆与南岛语族的文化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⑮黄应贵主编的《台湾土著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85),收入原住民研究论文二十多篇,以“台湾土著族的两种社会类型及其意义”为导论,以学术史和土著社会或高山族社会人类学诸问题的总体论述为通论,以原住民各分支的社会分层、社会形态、宗教结构、祖家制度、灵魂信仰、聚落形态、农业经济、土地制度、家族亲属、婚姻家庭、财产世系等繁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为专论,这些内容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学者在原住民研究上对社会人类学课题的特别关怀。《台湾土著文化研究》(1992)是陈奇禄先生的个人论文结集,是一部涉及原住民学术史、原住民物质文化、房屋聚落、艺术文化、社会组织、作物经济、区域关系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论著。^⑯此外,李亦园等的《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与评估》(1983),廖风德的《清代之噶玛兰》(1990),潘英海、詹素娟主编《平埔族研究论文集》(1995),李壬癸《台湾平埔族的历史与互动》(1997),刘益昌、潘英海主编《平埔族区域研究》(1998),潘英海、詹素娟主编《平埔族与台湾历史文化》(2001),也都是这方面的论著。

值得严重关注的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台湾原住民问题上也出现“台独”的杂音。“台独”御用文人为了达到分裂台湾民族与中国大陆历史联系的目的,在原住民问题上无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客观事实,恣意割裂原住民文化的大陆联系,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文化与东南亚南岛语族的历史联系。例如史明的《民族形成与台湾民族》(1992),以原住民文化的特殊性为借口,宣称所谓的“台湾民族独立”论。张德水在《激动,台湾的历史》(1992年),更是无视南岛语族大陆起源的客观史实,恶意混淆台湾原住民的马来民族(即南岛语族)属性与南来起源两个没有根本联系的问题,“高山族在种族上属于南方古蒙古人种的原马来人系,语言上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文化特质上属于印度尼西亚文化群,由此可以说,他们系由东南亚北上而移居于台湾者,其移住时期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大肆渲染“南来论”,由此作为民族“台独”的一根救命稻草,“原住民高山族的台湾不是支那(中国)固有领土”。^⑰

总之,台湾学者的原住民研究历史比较曲折,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光复初期的原住民研究有日据时代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影响,尤其是台北帝大后期以来逐步兴起的原住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亲属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有进一步的发扬和扩展。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受到1949年迁台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民族学研究所的一批大陆学者如李济、石璋如、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的学术影响,他们站在“中国一边疆”民族关系的立场看待台湾原住民社会文化。近年来,由于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台独”的理论需要,原住民研究中出现了否定“中国一边疆”民族关系的学术立场,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

二、大陆学者的台湾原住民研究现状及潜力

大陆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起源很早,上个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奠基人林惠祥教授,就两次深入台湾进行史前考古发掘和高山族社会文化调查,发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研究》等重要论著,^⑱从考古学资料、民族学角度,阐述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形态及其与祖国东南沿海百越民族的关系,成为大陆研究台湾原住民历史与文化的奠基之作。林先生还将在台湾调查所获的民族学、考古学标本珍藏在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成为大陆地区仅有的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实物资料。

建国以来,两岸隔绝,学术交流长期中断,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研究。在台湾原住民问题上著述最丰的是厦门大学的陈国强教授,陈先生直接秉承其师林惠祥的学术

遗产,充分利用林先生早年赴台调查所获的实物标本,通过对大陆福建等地滞留的少量台湾原住人群体的调查、了解,结合文献资料,开展高山族问题的研究,先后出版或与他人合著出版了《高山族神话传说》(1980)、《郑成功与高山族》(1982)、《高山族简史》(1982)、《高山族》(1988)、《高山族文化》(1988)、《台湾高山族研究》(1988)、《台湾少数民族》(1994)、《高山族民俗》(1995)等多种专著和数十篇文章。¹³此外,施联朱、许良国主编的《台湾民族历史和文化》(1987)、刘如仲、苗学孟的《清代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1992)、张崇根《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研究》(2002)、曾思奇主编《台湾南岛语民族文化概论》(2005)等,¹⁴也是内地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不多的几本论著。

最近十多年来,更有学者将台湾原住民的研究纳入整个华南、东南亚土著民族文化体系中观察研究,厦门大学吴春明的《中国东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1999年)、《台湾原住民及“南岛语族”起源研究》(2003)等,主张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角度,重建台湾原住民作为中国东南土著民族文化体系的一个环节的历史地位。¹⁵这类成果是在继承厦大林惠祥教授早年所创立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民族考古学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又受到了以张光直、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等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界关于“南岛语族”华南起源研究的影响,将包括台湾原住民在内的东南土著置于“背依华夏,面向南岛”的民族文化格局中考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台独”御用文人在原住民问题上炮制的“民族台独”论,他们相继发表《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2002)、《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商榷》(2003)等论述,¹⁶重建台湾原住民大陆起源、东南亚传播的客观历史,揭穿“民族台独”论恣意混淆“台湾原住民南来关系论”与“台湾原住民来源的南来论”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郝时远《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2003)等,以台湾原住民“正名”运动为切入点,分析了原住民经济社会生活、政治诉求,揭露了“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分裂祖国的图谋,驳斥“民族台独论”试图通过“泛南岛民族主义”宣扬“台独”目标的图谋。¹⁷

总之,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建国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难得的成绩。从成果的形式看,都是关于台湾原住民整体、宏观的概括,缺乏原住民各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专题研究论著,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上的一个特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迄今大陆民族、考古与历史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与研究还不够深入,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

首先,大陆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研究的着力不多。在我国浩瀚的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学术文库中,有关台湾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只能算是零星的,这与台湾原住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现阶段原住民民族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是不协调的。因此,在当前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遇,克服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上的种种不足和缺陷,系统、客观地重建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科学、准确地论述台湾原住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两岸民族关系的真实历史,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其次,大陆学者缺乏对台湾原住民社区的直接的民族志调查成果。除了已故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在日据时代调查台湾阿美族和台北圆山史前遗址,出版《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等著述外,不管是早年的陈国强、施联朱等先生,还是近年涉足该领域的郭志超、吴春明等,都没有对原住民社区直接的民族志调研经历,更缺乏大陆学者笔下的台湾民族志,这就使得我们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难免隔靴搔痒,不能深入下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两岸关系和缓的有利因素,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研究”课题范围内,组织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不同专业的学者,赴台开展原住民社区的实地调查、考察,对于提升大陆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理论研究也有待深入。我们在台湾原住民的研究中,多数成果停留在对原住民与祖国大陆关系的表层论述,对台湾原住民起源、历史与现状、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族群关系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比如,在起源上,虽然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史前考古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为原住民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两岸隔绝与比较研究的缺乏,台湾史前文化与原住民文化间的源流关系

一直是民族学和考古学上的一个悬案。又如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由于原住民的多样性、族群迁徙的时间先后与多层性，甚至多源性，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传说、语言内涵、礼仪习俗、宗教信仰、造型与平面艺术、音乐歌谣等，都十分丰富与复杂，目前也缺乏深刻的类型学疏理。社会经济方面，不管是部落社会的组织结构，还是原住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与开发等，也都有待深入探索。

第四，族群研究的不平衡，尤其是传统民族学异文化猎奇的弊端在原住民研究中表现明显，对高度汉化且与汉民族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平埔族的研究一向十分薄弱。日据时期，除了伊能嘉矩以外，日本学者几乎都只重视尚未汉化的山地高山族研究，光复以后情况并没有很好改变，以至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平埔族研究几乎空白，只有卫惠林等对埔里盆地巴宰七社等个别平埔族群落的调查研究。作为台湾原住民族群中与迁徙来的汉人最早接触、高度汉化的支系，平埔族不仅是观察了解原住民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研究台湾原住民与汉民族文化融合进程、研究清代“理番”以来汉人政治主导下原住民社会文化变迁进程的重要标本。因此，新时期作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要全面开展原住民社会历史与经济文化的调查研究，更要针对性地重视平埔族历史与文化的重建。

因此，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起源发展、族群文化、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重建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重新认识台湾原住民在东亚民族总谱系中的地位，是新时期我国民族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项理论课题。

从现实的需求上说，台湾原住民的来源与性质，一直是民族学领域“台独”与反台独两大阵营斗争的焦点，一些台独御用文人捏造的原住民“南来论”已成为“民族台独”的理论基石。“台独”分子在台湾区域人群研究中抛出了分裂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独立论”，将台湾原住民与东南亚“南岛语族”均起源于我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历史事实，歪曲成台湾原住民来源于东南亚的“南岛语族”的“南来论”，在一些论著中声称原住民在种族上属于南方古蒙古人种的原马来人系、语言上属于马来—利尼西亚语族即“南岛语族”、文化特质上属于印度尼西亚文化群，他们系由东南亚北上而移居于台湾者，原住民高山族的台湾不是支那（中国）固有领土。在平埔族问题上，声称“平埔族文化变迁是大汉族沙文主义的结果”，把明郑政权、清朝政府称为“外来政权”和“殖民者”，“台湾是中国海外殖民地”，“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就是属于凡认同这块土地的台湾人，原住民才是真正的台湾人，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因此，运用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科学、认真、深入地探讨台湾原住民的起源，研究我国东南土著民族文化与台湾原住民的源流关系，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大局观来认识、研究台湾原住民，论证台湾原住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文化谱系中的地位，客观分析台湾原住民与东南亚“南岛语族”的文化关系，最终肃清台独御用文人的台湾原住民“南来论”和“民族台独”，维护台湾地区民族融合、两岸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更是新时期大陆民族、考古与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三、台湾原住民综合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时期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总体框架是，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社会经济与文化、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为科学地认识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文化面貌、准确地把握两岸民族文化关系的本质、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服务。围绕这一总体框架和目标，现阶段应该重视的几大课题为：

1. 台湾原住民的起源及其在周邻民族关系中的位置。

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问题，不仅是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基础，也是认识台湾历史的基础，还是了解东南亚、大洋洲南岛语族文化来源的关键点。这一课题必须充分运用台湾史前考古新发现、原住民民族志、比较语言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和资料，研究

台湾史前文化的内涵、形态与特征, 史前文化谱系与原住民现代族群谱系的源流关系, 比较两岸及东南亚、大洋洲史前文化的关系, 比较大陆地区畲族、黎族、瑶族、壮族、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南方汉人中的土著成分与台湾原住民、东南亚及大洋洲“南岛语族”的民族志文化关系, 开展大陆、台湾、东南亚及大洋洲土著人群的比较语言学和分子生物学抽样调查研究。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比较研究, 重建大陆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传播台湾、东南亚及大洋洲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而在宏观背景下把握台湾原住民的起源, 厘清亚太民族源流与关系史。

2. 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与现状

该研究将充分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材料, 探讨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中, 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发展、族群迁徙、融合变迁、山地高山族与平原平埔族的形成发展, 以及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原住民构成与现状。原住民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原住民与汉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 涉及到汉人移民台湾的历史进程, 明郑时期、清代、日据时代对山地番族和平埔族地区的开发, 尤其是清代理番事业的政策、实践与结果等重大民族史、政治社会史、经济文化史课题。针对台湾原住民历史研究中平埔族研究的薄弱, 将深入研究清代平埔族历史与文化这一热点和难点, 认真梳理清代以后平埔族的社会文化变迁。

3. 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

开展台湾原住民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调查研究, 是深入、准确地认识台湾原住民的必要环节。这项研究将充分吸收日本学者、我国台湾学者和大陆林惠祥等前辈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社区所作的调查研究成果, 运用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等地收藏的反映台湾原住民多样文化内涵的藏品,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人员赴台开展最新的原住民民族志调查, 在这些资料整合的基础上, 运用社会文化人类学多种理论, 系统研究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这一课题包括原住民社会中“阶级”与“前阶级”两种组织结构的现状, 原住民不同族群的人群关系及其与汉族的关系, 婚姻、家庭、家族与财产继承制度, 生态环境、聚落形态与建筑、经济生活、生产方式, 原住民多样的竹、木、贝、陶、树皮、骨、角等器具文化的形态与分类研究, 原住民语言符号的内涵、分类及其在南岛语族中的系统地位, 原住民的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的灵魂观念、自然崇拜与佛、道、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杂合与分层认识, 风俗习惯、历法系统、四季节庆等, 开展两岸及东南亚、大洋洲跨区域土著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4. 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

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在当代台湾政治格局复杂化的背景下, 族群关系、族群矛盾、统独意识等社会文化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在政治生活中被人为歪曲, 尤其是被“台独”分子广泛操弄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原住民的族群关系也不例外。本课题将客观地调查、分析台湾原住民各分支的族群关系历史与现状, 研究原住民与汉民族群的矛盾与融合, 探讨台湾原住民与汉民族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 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台湾原住民与祖国大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途径。

注 释:

¹ 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台湾原住民之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④ 刘如仲、苗学孟:《清代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杨熙:《清代台湾: 政策与社会变迁》台湾天工书局1983年。

^④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译:《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观》,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5年; 刘斌雄:《日本学人之高山族研究》, 载黄应贵主编《台湾土著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陈奇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与台湾土著研究》, 《台湾的博物馆和人类学的发达》, 载陈奇禄《台湾土著文化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视野公司1992年。

^{1/4} 陈其南:《光复后高山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载黄应贵主编《台湾土著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1/2} 陈绍馨(人口与家庭)、石璋如、陈奇禄(物质文化)、林衡立(宗教)、董作宾(时间)、瑞逸夫(系谱)、李济(体质):《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 载台湾《文献专刊》1950年1卷2号。

^{1/4} 卫惠林、何联奎:《台湾风土志》(1956);《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1958);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稿》(原住民

- 各族篇), 1965年; 李亦园、徐人仁、宋龙生、吴燕和:《南澳的泰雅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5号)》1963年; 阮昌锐:《大港口阿美族》,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18号)》, 1969年; 石磊:《筏湾, 一个排湾族部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21号)》, 1971年; 台湾省民政府,《61年台湾省山地山胞经济调查报告》, 台湾省民政府 1973年。
- ⑧卫惠林、刘斌雄《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1号)》, 1962 李亦园:《阿美族的物质文化》,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之二, 1962年; 刘斌雄、丘其谦、石磊、陈清清:《秀姑峦阿美族的社会组织》,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8号)》, 1965年; 丘其谦:《布农族卡社群的社会组织》,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7号)》, 1966年; 王人英:《台湾高山族的人口变迁》(1967); 陈奇禄:《台湾高山族之物质文化》(1968); 费罗礼:《台湾土著族的文化、语言分类探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 1969年; 何廷瑞:《台湾高山族的传说与神话》(1970); 石磊:《台湾土著血型亲属制度: 鲁凯排湾卑南三族群的比较研究》(1976); 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台北联经文化事业出版公司 1982年; 黄应贵《东埔: 一个台湾中部布农族聚落的社会组织及其现代适应》,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第28号)》, 1983年。
- (七)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年。
- ⑨李壬癸:《台湾原住民的族群与迁徙》, 台北常民文化出版公司 1997年。
- ⑩陈奇禄:《台湾土著文化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视野公司 1992年。
- 11 史明:《民族形成与台湾民族》, 三森制本所 1992年; 张德水:《激动, 台湾的历史》, 前卫出版社 1992年。
- 12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 1930年; 《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研究》, 《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 13 陈国强:《高山族神话传说》,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年; 陈国强:《郑成功与高山族》,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 高山族简史编写组:《高山族简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 陈国强、田珏:《高山族》, 民族出版社 1988年; 陈国强、林嘉煌:《高山族文化》, 学林出版社 1988年; 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研究》, 三联书店 1988年; 陈国强、田珏:《台湾少数民族》,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 田富达、陈国强:《高山族民俗》, 民族出版社 1995年。
- 14 施联朱、许良国主编:《台湾民族历史和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年; 刘如仲、苗学孟:《清代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张崇根:《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2年; 曾思奇主编:《台湾南岛语民族文化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5年。
- 15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年; 吴春明主编:《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第 20040165 号。
- 16 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 《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吴春明、陈文:《“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商榷》, 《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 17 郝时远《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 陈家柳]